

论陶渊明的家庭情结

兰寿春

(龙岩学院 中文系, 福建 龙岩 364000)

关键词: 陶渊明; 家庭情结; 仁爱; 至性深情

摘要: 通过分析陶渊明的家世背景, 并列举其孝敬母亲、体谅妻子、关爱孩子等具体表现, 探讨诗人热爱亲人、热爱生活、至性深情的家庭情结和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

Tao Yuanming's Family Complex

LAN Shou-chun

(Chinese Department, Longyan College, Longyan 364000, China)

Key words: Tao Yuanming; family complex; benevolence; deep love

Abstract: Strong family complex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Tao Yuanming's emotional world. He showed filial obedience to his mother,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for his wife, loving care for his children. It reflected the poet's deep love for his family members and for the life.

一

陶渊明思想性格的形成及人生道路的选择, 与他浓重的家庭情结有着重要的联系。虽然它不是唯一的解析, 但许多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在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上, 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孟氏。渊明年少时连遭两次变故: 8岁时父亲去世, 12岁时庶母去世。从此孟氏独力支撑着一个家, 把渊明及其庶母生的女儿(即程氏妹)抚养长大。可以肯定, 孟氏给了儿子莫大的教育与引导。

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知书达理。在丈夫去世、家境日窘的情况下, 作为母亲, 她仍传承陶氏家风; 作为妻子, 她还带来娘家的文化风尚。陶渊明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人都做过官。根据《命子》诗中的描述, 可以把他们的功德归纳为三点: 一是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精神。曾祖陶侃出身贫寒, 早年丧父, 从小就很有抱负, 读书之余又

苦练武功, 入仕之后为朝廷征战平乱, 屡建功勋, 被封为长沙郡公; 祖父担任太守而能“惠和千里”, 造福百姓; 父亲虽然不热衷仕途, 但毕竟还是做官干了些事业。二是谨慎处世、善始善终的品德。陶侃位至公爵, 能做到“功遂辞归, 临宠不忒”, 急流勇退; 祖父也能做到“慎终如始”。三是淡薄名利思想。影响最直接便是渊明自己的父亲, 他为官“淡焉虚止”, 不孜孜追求功名利禄, 既能建功立业, 又能谨慎处世、淡薄名利。这三点我们姑且称之为陶渊明的家族精神。当然, 对于8岁时父亲就去世的陶渊明来说, 这些只能通过母亲的诉说而得知。渊明长大成家之后, 当喜得长子俨时, 便在《命子》诗中又把这种家族精神传给了自己的下一代。由此, 我们再来审视陶渊明为什么在仕途上几进几出, 乃至归隐田园, 其中的内在原因就更加明白了。

孟氏的娘家是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其

收稿日期: 2004-04-02

作者简介: 兰寿春(1963-), 男, 福建龙岩人, 讲师。

父孟嘉担任过劝学从事,举为秀才,又做过江州别驾、巴丘令、桓温的参军。关于孟嘉的生平事迹,《晋书·桓温列传》之后附有孟嘉的小传,在陶渊明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则更为详细。据此,我们也可将孟嘉的立身行事概括为三点:一是为人随和而有原则。他“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色和而正”,“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二是善写诗文。他命笔作文“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三是嗜酒酣饮,任情自然。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桓温曾经问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嘉笑着回答说:“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事实证明,孟嘉的这些特点对陶渊明性格和文学爱好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袁行霈先生就明确指出:“渊明之嗜酒而得酒中趣,渊明之崇尚自然,皆有所自也。”^{[1](P501)}

苦难,并非都是阻力;逆境,造就了陶渊明。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评价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从这里我们看到,年轻的陶渊明不但饱读诗书,而且抱负远大,而这一切都与孟氏的教导督促是分不开的。

对于母亲的培养和教育,陶渊明始终是充满了感激和孝敬之心。母亲在世期间,由于“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渊明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出去做官,“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指的就是这件事。就出仕而言,一者可以实现自己“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理想,将少壮时的抱负付诸实践;二者可以获得俸禄以养家糊口。但是,孝敬母亲、体谅妻子、疼爱孩子,这浓浓的家庭情结时刻牵系在渊明的心头。把他相关的几首诗联系起来,我们看到:他离家出仕时是流着泪告别亲人,“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杂诗》);舟行路上,心里想的是“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夜行涂口》);返乡探亲途中归心似箭,偶遇风阻航船,他屈指数着日子,急切盼望着能“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风吹浪涌声中,他想到的是“静念园林

好,人间良可辞”(《阻风于规林》)。为了宁静美好又充满温情的家园,陶渊明宁愿离开官场,“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当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身在江陵的陶渊明悲痛万分,立刻辞官回家奔丧。在《祭程氏妹文》中,陶渊明回忆丧母时的情形:“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云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尽哀尽孝!

居丧期间,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文中再次深深思念自己的母亲:“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凯风》寒泉之思,喻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语出《诗经·邶风·凯风》。该诗是一首儿子颂母、自责的诗。渊明认为《凯风》“实钟厥心”,借古人之诗表达自己的无限思念之情,真切反映了他对母亲的至孝!

二

对于母亲来说,渊明是孝子;对于妻儿来说,渊明是尽责的丈夫,是慈父。

有关陶渊明妻子翟氏的资料甚少,明毛晋绿君亭本附录指出,翟氏出于浔阳著名隐士翟汤一族。《晋书·隐逸传》:翟汤,字道深,浔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不受别人馈赠,朝廷数次征辟皆固辞不受;汤子庄,遵汤之操,惟以弋钓为事;庄子矫,亦有高操,屡辞辟命;矫子法赐,孝武帝以散骑郎征,亦不至。^{[2](P2445)}倘若毛晋考证为确,从时间上推测,陶妻翟氏应是与法赐的女儿同辈。翟氏秉承了先代的隐德,所以能与渊明同甘共苦,白头偕老。

从现存的一点材料来看,陶渊明是很体谅、关爱妻子的。翟氏一嫁过来,就要抚养前妻留下的4个幼儿,不久又有了自己的儿子。抚育5个孩子,翟氏的确不容易!因此,陶渊明在家一有空就亲自管教儿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他襟怀坦荡地告诉朋友:“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农忙时他又高高兴兴去地里劳动,“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怀古田舍》)。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一家人的和睦与快乐!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自白:“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秫,过足为润,故便求之……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他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所获可资养家,让饥贫的家庭丰润一些,让妻子的眉头舒展一些。爱家之情,坦坦荡荡!

当然,也有陶渊明埋怨妻子的时候。《与子俨等疏》一文中有“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袁行霈先生认为“此既一事矣”意谓陶渊明埋怨“妻子不如孺仲妻之贤也”^{[1](P535)},渊明的行为“不为妻子理解。”^{[1](P540)}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后一句中陶渊明自己也隐约透露出对妻子的薄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莱妇:老莱子之妻,典出刘向《列女传》。“室无莱妇”是说家里没有像老莱子之妻那样的人,印证了袁氏的观点。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与萧统《陶渊明传》:“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及《南史·陶渊明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相比较,不是相矛盾了吗?

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弄清陶渊明为何会有“莱妇之叹”?查考《与子俨等疏》和《饮酒》组诗的写作时间与背景,我们发现,在义熙十一年(415)至义熙十三年(417)这三年间,陶渊明面对归隐后是否再次出仕的烦恼最为集中。关于朝廷曾征召陶渊明为著作郎,而他称疾不到,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的时间,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年谱简编》(下称《袁注》)与龚斌先生《陶渊明传论·陶渊明生平及作品系年》(下称《龚论》)都认为是在义熙十一年(415)。而《与子俨等疏》的系年众说不一,比较一致的是王质《栗里谱》、逯钦立《绪年》和李锦全先生《陶潜评传》皆谓此文作于义熙十一年(415),陶51岁。也就是说,《与子俨等疏》作于不应征著作郎之后的同一年,当是有感而发。归隐后是否再次出仕,陶渊明和妻子、亲戚朋友之间有过较大的争论,否则陶渊明不会把内心的痛苦曲折含蓄地吐露于诗文。《饮酒》组诗的系年,汤汉注、王瑶注和《袁注》都将其定为义熙十三年(417),《龚论》则定为义熙

十二年(416),仅相差一年。当时,正是刘裕势力增强,影响日益扩大之时,陶渊明曾当过刘裕的参军,自然会有人劝他复出,再次投靠刘裕。而且此时的陶渊明一度痼疾加重,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这种情况下翟氏劝丈夫出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使事过两年之后(416或417年),仍有好心的田父大清早地提酒来找陶渊明喝酒谈心,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饮酒》其九)。由此可见,陶渊明要保持高洁的志向,坚持隐逸避世的初衷还真不容易!

对于“莱妇之叹”,笔者认为,一是翟氏在困难面前曾有怨言。二是作为母亲的她处处要为全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必然讲求实际。但翟氏虽有怨言,不理解,却不反对丈夫的选择。正因为他们夫妻并非完全没有矛盾,所以更见其真实可信。

陶渊明对5个儿子的培养教育,既有《命子》诗中的殷切期望,又有《责子》诗中的平和慈爱。无论儿子们是贤是愚,陶渊明始终都牵挂在心。“浔阳三隐”之一的刘柴桑写信招陶渊明上庐山索居事佛,可是渊明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生哲学,因此在《和刘柴桑》诗中,陶渊明以“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为由,婉言谢绝了刘柴桑的邀请。唐释法琳《辩证论》七引《宣验记》:“刘遗民(即刘柴桑),彭城人,家贫,卜室庐山西林中,多病,不以妻子为心。”渊明不愿索居事佛的原因,却是“以妻子为心”。他希望的就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甚至到了晚年,儿子们都长大了,陶渊明还在《与子俨等疏》中谆谆教导他们要团结和睦,同居同财。唐代白居易很敬慕陶渊明的为人,曾专门到栗里访问陶渊明的旧居,慨叹“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子,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访陶公旧宅》),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陶渊明孝敬母亲,体谅妻子,关爱孩子,热爱家庭。他能超脱官场名利,却不能忘怀亲情和责任。从中我们看到了陶渊明丰富的情感世界和高尚的人格精神。清·方宗诚《陶诗真诠》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3](P254)}正是说到了

点子上!

三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政权的频繁更替,生命的短暂难测,于是士人远离政治避免祸患;又由于礼教束缚的松弛,老庄思想获得了人们的崇尚,人的正常感情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喜怒哀乐作为人的本性也得到尽情的发挥,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乃至爱天地万物的泛爱之情都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王戎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4]可谓道出了晋人重情的人格。

龚斌在《陶渊明传论》中指出,晋人之所以超脱而又一往深情,“最直接的原因是晋人深受玄风的熏陶。”^[5]此论透辟!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说:“从《古笈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来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次,《论语》第二,共37次,《列子》第三,共21次。”^{[3](P288)}陶渊明这么熟悉道家著作,并引用于诗文,言行上任真自然,的确是反映了魏晋玄学的崇尚自然之旨,在表现自然、人生以及隐居情趣的诗文中尤见如此。但他的深情厚意,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上,则更多的是直接源于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提到“仁”字的文句不少,如:《命子》诗中他称颂先父“于穆仁考”。《感士不遇赋》中他说:“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明确表示自己要“发忠孝”、“生信义”,认为仁者善者会得到天道的辅佑。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对此,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

传》中说:“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祭从弟敬远文》中他又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这看似无理,实是有情,他为外祖父和从弟敬远的去世而痛惜悲伤,他多么希望仁者能够长寿,因为“仁”在他心目中占了太多的位置!对儿子们,他也是这样告诫的:“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与子俨等疏》)。陶渊明的仁爱思想不止限于家族成员,他送一仆给其子时,在信中特别叮嘱儿子:“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杂诗》中他又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他把农民朋友视如兄弟,可见诗人宽广仁厚的胸怀!

儒家的仁爱思想让陶渊明热爱亲人、热爱生活,也是这份深情、这份家庭情结,成为他乐于归隐、安于田园和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他创作出不朽诗文的生活源泉。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 (唐) 房玄龄, 褚遂良, 许敬宗.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北大、北师大中文系师生.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4] (魏晋) 刘义庆. 世说新语[M]. 桂林: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6. 351.
- [5] 龚斌. 陶渊明传论[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1. 116.

[责任编辑 刘福铸]